本书的篇幅甚短，只不到十二万字，但作者刘子健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却在学术界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至今仍时时被人引用。若只看标题，会以为本书采用的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写法，但本书更多采用的是政治史的方法。因此，本书的内容虽与思想史有所重合，但作者在写作时往往只偏向一端，政治史的色彩尤为浓厚。作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详略得当，但我们之后将看到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分析的是从北宋到南宋的差异。作者跳出了以往论者所假定的，南北宋之间的连续性，而是着重关注其间的变化与差异。这一视角无疑是别出心裁的，也颇具道理。这一部分似乎只偏重文化，作者选取了文学、经学和史学作为学术的代表进行分析。对于宋代儒学的分析，则显得比较简略。

第二部分就完全是政治史的写作。作者主要回顾了高宗朝的宰相政治——即皇帝与宰辅大臣之间的互动，并在本部分的最后一节选取了赵鼎作为个案加以仔细研究。无论作者所指的“道德保守主义”具体意涵为何，在本部分中，作者为我们传递的信息主要为：南宋高宗树立了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一切都得仰赖皇帝的决策，这促使理学家们认为因此积极的政治干预只能从皇帝的教育开始。这是在极权主义政治下最现实的选择。

第三部分名为“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一部分中，作者简要谈论了理学成为“正统”的历程，并加以评价。作者认为：新儒家（主要指理学）本身转向了内在，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没有方向性的转变，越来越呈现出教条主义的口吻；理学正统的观念支持现存的等级秩序，则国家政权有可能去调整、操纵它，甚至为政治控制的目的歪曲它。这构成了作者所说的“得不偿失的胜利”。

综上，则作者所谓的“中国转向内在”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政治上的压力，促使理学家们以道德为政治的突破点，构建起一个内向的、自我充实的系统；随着理学成为“正统”思想，理学所具有的“内向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特征，进而对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但细细分析，在本书极为简要，甚至是疏略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逻辑链条在多处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一，就政治史对思想的作用上，作者主要认为是高宗朝的“君主独裁”政治遗产对朱熹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早在北宋二程时期，理学的“道德主义”取向便已确立，朱熹无非是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完善，而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同样是思想史的研究，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我们更能看到北宋以来政治思想对朱熹的影响，可能还要比高宗朝来得强烈。作者对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并不算足够深入。

二，作者所指的“内向”几乎完全是就“理学”而言的。但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理学在整个南宋，所有的影响力一直是有限的。此外，南宋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力也为作者所夸大，作者写道“它（指南宋）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却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但作者的实证分析从未越过宋朝，因此作者似乎未能看到宋元之变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带来的巨大割裂。这一断裂对理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亚于朱熹的理学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仅政治史影响了理学的诞生，也影响了其“成熟”之后形象、内涵的转变。

总的来说，笔者认同作者所提出的，在理学影响下的明清中国，文化整体上呈现“内向”、“固守”的特性，在其中理学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致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传统”的时代（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传统”一词的语义内涵，今人在指称中国古代的传统时，往往将明清的特质作为帝制时代的典型，这在许多方面都是误解，原因之一即为作者所说的，“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笔者对作者的许多分析都不能表示无保留的赞同。作者对于“内向化”本身的分析太少了，本书缺乏对“内向化”的实证，其范围、程度如何，都没有得到展示。“中国转向内在”论的问题已在上面有所揭示，从当下来看，作者的“文化内向”论已经“过时”，而现在仍引用此观点的学者，对此观点理解可能还远远达不到作者的本意。就笔者以为，“内向化”的最终完成并不在宋代，而在明初，蒙古的入主或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或是抑制了其他的可能，总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将宋元之际的历史打通，可能才能对“中国转向内在”这一命题，有更深入、准确的理解。

最后要谈的是本书中的一些有趣细节。作者关于文化演进的观点值得思考：“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防止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作者将中国传统的“政教”概念类比为“意识形态”，此颇可注意；高宗朝的相权升降可值得再看，而如果就韩侂胄、史弥远的权责来说，所谓“君主独裁”的政治遗产生效甚短。“中国转向内在”也可部分地视为对内藤湖南学派的“唐宋变革论”的回应，“近代早期”的宋代没有接踵而至的“近代中期”，这一观察显然是有见地的。